


红军长征纪实丛书

红四方面军卷

6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



 中共党史出版社

红军长征纪实丛书



红四方面军卷

6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

 中共党史出版社

本册收入第十二至第十三部分文章 75 篇

长征路上的女兵

——长征生活回忆片断

林江

提到长征，很自然地会使人想起爬雪山过草地的惊心动魄的奇迹，而对当时的红军女战士来说，要完成这一艰巨的斗争任务，更有特殊的困难。但是，女红军们在万难中有一个共同信念：相信革命必然要获得胜利，因此，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，她们和男同志一样，用丹心碧血，用无穷智慧和勇气，排除万难，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。她们在令人难以想象的极端艰苦的环境中，充满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，有的女战士由于长途跋涉两脚红肿了，溃烂了，仍然斗志昂扬地前进。“英勇坚定，排难创新；团结奋斗，不胜不休！”这是当时的红军女战士在长征途中最爱唱的一支歌子，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支歌子。

在长征途中，不仅要征服雪山草地，还要和敌人打仗。蒋介石和地方军阀的反动军队前面堵、后面追，天上炸、地下轰。因此，红军女战士们除洗衣、做饭、护理伤员、作宣传工作、组织群众武装、帮助人民群众建立自己的政权外，也和男同志一样要冲锋陷阵，和反动军队战，她们英勇顽强，宁死不屈，出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。记得

1934年“五一”前夕^①，我们妇女团有13个女同志（九个护士、三个炊事员、一个洗衣员），护送100多名伤员到懋功三十一军医院。结果因医院转移未寻到，却碰上了一个营的残余敌人。遭遇战开始了。敌人见我们都是些伤员和女兵，于是得意忘形地包围我们，并疯狂地向我们扑来。从早上到下午3点钟左右，我们打退了敌人四次冲锋，消灭了不少敌人，但我们的阵地也缩小了，敌人又增加了兵力，情况十分严重。为了伤员的安全，班长马志海同志主持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，在我们13个工作人员的要求下，决定重伤员由轻伤员扶助，一起突围。我们13个女同志打掩护。这天晚上星月无光，我们13个女同志由一个外号叫“红鸟”的同志（可惜我忘记了她的姓名，因为她的双手枪打得好，大家送了她这个外号），以党支部组织委员的身份，组织大家宣誓，“我们一定要保住伤员，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！”

当伤员撤退后走了20多里远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又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，山下一片火光，敌人疯狂地烧着民房。为了保存实力，减少伤亡，“红鸟”同志再三要求我们突围，她一人打掩护。可是在这样的紧急关头，谁能贪生怕死让自己的同志单身担险呢！我们说，“要死死在一起，决不让敌人讨一点便宜！”可“红鸟”同志却严肃地说，“这样作正是给敌人的便宜，牺牲要有价值，我们要保存党的有生力量”。

当我们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时，只见我们那一小块阵地上燃起了一片烈火，响起了密集的枪声，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敌人的嚎叫声。“红鸟”同志再也不能和我们12人见面了，她英勇的、亲爱的形象，永远鲜明地留在我们心里。（江沛整理）

选自《湖北日报》1961年4月27日。

^① 此处回忆时间不准确，应为1935年初夏——编者注。

长征后，父母才知道我参加了红军

侯敏

换盐巴 跟上红军就走

1933年6月，我的家乡川北旺苍县白水乡来了红军。那天正逢赶集，父亲叫我去换些盐巴。只见街上到处是人，有几个剪着齐耳短发、穿灰衣服、打着绑腿的女红军在人群中讲着什么。我挤过去一看，原来是“扩红”报名处。一个高个子女红军说：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……我鼓起勇气问：“女人也能当兵吗？”她说：“当然行。”我问：“那你们要不要我呀？”招兵的人打量着我问：“你几岁了？”我把年龄多报了两岁：“15岁。”招兵的人说：“当红军可是要走路的哟，你走得动吗？”我挺起胸膛回答：“怕什么？别说走路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”就这样，我成了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的一名女战士。由于走得匆促，来不及跟家里人说，父母还以为我出了意外，到处找了一个星期。四年后，我到延安时给家里去信，父母才知道我参加了红军。

长征开始，我从宣传队转入后勤队，负责运送伤病员和部队给养。我的肩膀因为抬担架，常常压得又红又肿，晚上痛得睡不着觉。

有一天，在松潘地区，后勤队在运粮途中遭遇国民党部队。前边的战士冲出去了，我们十几个人被包围了。附近无险可守，大家上了藏民的平顶房。枪少，子弹也少，我们等敌人靠近才开枪，接连打退敌人几

次进攻。敌人把平房团团围住。我的子弹打光了，右小腿一麻，中了子弹。我想，要是敌人上来，我就是用牙咬，也要和他们拼尽最后一滴血。在夜幕中，我们静静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。就在这时，枪声、手榴弹爆炸声大作，救援部队赶到，我们才脱离了险境。

过草地 泥沼吞没战友

过草地前，粮食短缺。上级要求部队筹粮，强调“群众的粮食要用钱买或茶叶换，无钱要给购粮证明，说明将来还钱。对喇嘛寺严禁私自筹粮，除没收反动头目的粮食外，其他应照价收买”。然而，藏民都跑了，饥肠辘辘的部队望着满山的青稞麦，却没人去折下哪怕一根麦穗。

有一天，我们在当地打了反动土司，打开了“密窖”粮仓，每人扛50斤青稞麦回驻地。先把青稞麦送到医院分给伤病员，剩下的每人分五斤，个子大的男同志分八斤。每人还打了两双草鞋。

草地是一望无际的沼泽地，踩在软绵绵的草墩上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潭。进入草地的第二天，同班战友王玉香掉进泥潭。我连忙伸出树枝做的拐棍拉她，她过于紧张，几次都没抓牢，越挣扎陷得越快，才几分钟黑泥水就淹到脖子。她说：“小侯，别拉我了，不然你们也会陷进来。”就这样，大家眼睁睁地看她被泥沼吞没了。我们只能流着泪，默默地哀悼战友。她是四川巴州人，牺牲时才21岁。

我们每“餐”只吃一小把青稞麦，可粮袋还是很快见了底。班长胡立秀是湖南人，认得很多野菜，大家就跟着她挖。每回“开饭”，都能煮上一锅野菜汤，每人喝一碗充饥。有时实在饿了，我就在路边拔点野菜，边走边嚼。

草地气候多变。太阳出来能晒死人，可转眼间又是大雨裹着冰雹

往下砸。夜里温度竟降到零度以下。晚上宿营，大家只能找块比较干的地方，燃起篝火，几个人背靠背坐着取暖。每天早起，宿营地都要留下许多长眠的英灵。有一天早上，部队要出发了，路边一床被单下还睡着几个人。大家喊他们一块走，可被单下一动不动。揭开被单一看，几位战友的躯体已经冰凉了。由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危害，我们红四方面军来回过了三次草地。每次过草地，总有一批战友永远留在了草地深处。

过雪山 与死神擦身而过

1936年春初，我们翻越了党岭雪山。此山主峰海拔5000米，山顶终年积雪，雪崩不断。当地藏民说，山上下午起风暴，翻越主峰必须赶在中午12点前。下午，我们开始翻越党岭雪山，山道一边是松软的雪岩，一边是陡峭的雪壁，路中是晶亮的积雪，一不小心就会滑入山谷。战士们穿着单衣，冻得浑身哆嗦，许多同志的脚被冰碴划得鲜血直流。我们班的女同志一手撑木棍，一手拉着前面战友的衣襟往上爬。晚上，我们在一个稍微避风的山崖下宿营，大家抱着取暖，过了一夜。第二天天亮后，我们发现了许多战友冻硬的遗体。

越往高处走，山越陡，积雪越深，空气越加稀薄。大家胸口像压上了巨石，透不过气来。走着走着，身后哗啦一声，我回头一看，同班张大姐和一位战友一脚踩空，落进了深深的雪坑。我捅捅前面的班长，哆嗦着嘴报告：“他们掉下山了。”班长回头看了看，两位同志已踪影全无，只能含泪轻轻对我说：“别说话，快跟上部队。”

下山时，大家一个个坐着往下滑。到了山脚下，我感到十个指头钻心地疼，一看，满手是泥和血，十个指甲盖不知什么时候被掀掉了。

到了甘肃会宁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，我们班上的 11 名女兵，只剩下五名。（鲁军、成林整理）

选自《福建党史月刊》2006年第10期。

侯敏，原名侯正芳，女，1920年生，四川旺苍人。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红军长征时任红四方面军某部宣传队员、后勤队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曾为福建省军区正师级干部。2008年在福州逝世。

和哥哥一起当红军

万曼琳

哥哥名叫万兴煜，小名癸娃子。他高高的个儿，圆圆红红的脸庞，一双沉静的大眼睛，明亮有神，模样儿很像母亲，正当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的年月里，哥哥长大成人了。他已经是一个16岁的大小伙子了。哥哥只念过两年小学，但是很聪明，很讲道理，很听母亲的话，这使母亲得到很大的安慰和帮助。

哥哥心灵手巧，他会打铁器，会做木工活儿，会编竹器，还会给牛治病。

我最喜欢跟哥哥去地里劳动。我们家的地是老林边上一片叫大地坡的陡地。从家门到地里要走二里多路，在上山的路上，哥哥就像变戏法耍魔术那样，迅速神奇地做很多玩具给我玩，或从小树上摘一片叶子丢到嘴里，就能吹出悦耳动听的歌儿，他还能吹出各种鸟儿的叫声。到了地里，哥哥辛勤地劳动，如果是锄地，我就拔草，是收甘蓝，我就把能抱得动的甘蓝抱在一堆儿。

哥哥最喜欢植树，我们家的房子周围长满了高大的核桃树、板栗和竹子。长得最好的，是哥哥亲手种的两株姜朴树，他经常给这两棵树浇水施肥，精心培植。待到三四月里，姜朴树开花，满树雪白，像玉石一样洁净，其景象壮美极了。前两年我回到故乡，看到树的姿容富丽堂皇，壮美仍不减当年，见树如见人，若哥哥今日还在世，那么，他也一定像

这姜朴树一样刚劲而健美。

“红军来了！红军来了！”听有人说，红军前几天打开了南江城，昨天打开鬼门关镇，今天到了黄柏埡，很快就要来到我们蟒洞坝。因为国民党军队造谣说：“红军杀人放火！”所以，大家就都跑到老林里藏起来。红军到了蟒洞坝，亲自进老林叫我们回家。我们回到家里一看哪！院子扫得干干净净，屋里的家具什物放得整整齐齐，东西一样没少，红军待人很亲热和气，对老年人有礼貌地称呼，而且特别喜欢集合起青少年，教大家唱革命的歌儿。哥哥最爱红军。他形影不离地整天跟着红军到处跑，帮助红军做事情。

红军在蟒洞坝开大会，给大家讲打土豪分田地，打倒土豪劣绅国民党反动军阀等等这些革命的道理，蟒洞坝成立了平分土地委员会，哥哥被推选为委员。他身上装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，整天忙着平分土地的事情。由于哥哥努力工作，进步很快，不久又被提拔担任秘书工作。

秋天里一个早晨，哥哥从区上回来了，他告诉母亲说，白军要来“围剿”苏区，苏维埃和红军要转移。领导决定：在苏维埃工作的年轻干部随红军撤退。母亲要同哥哥一起随红军走，开始哥哥不同意，因为情况紧急，不能拖延，于是，哥哥就同意了母亲的意见。哥哥背了几件衣裳和干粮，嫂嫂背着侄娃子，母亲拖着，我们一家人就这样离开了家……

自从离家以后，昼夜不停地在崇山峻岭异乡陌生的路上行走。走啊！走……也不知走了多久，走了多少路，干粮吃完了，红军也不知到了何方？找不着红军，哥哥心里非常焦急。一天，我们来到了一条大河岸上。这时河里正发大水，河边聚集了很多人，大家都抢着涉水过河，哥哥挽着母亲背着我，嫂嫂背着小孩，我们一同过河，忽然一个浪头把嫂嫂打倒卷走了。当时，母亲几次跌倒在水里，哥哥腾不出手来抢救她们母子俩……

过了河，母亲不离开河岸，她望着奔腾的激流，痛哭不止。哥哥苦劝很久，我们才离开河岸，随着慌乱的人群继续往前走。晚上，就

在崖下露宿，哥哥拾来柴火和稻草生火给母亲烘干衣服，挨到天明，继续向前走。母亲因为悲伤、饥饿，耳朵里灌了水，得了重病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哥哥向一家农民哀求借一间草棚住下来，又向房主要了一些干草铺在地上，让母亲睡在上面，母亲身上发烧，一夜不停地呻吟，没有睡觉。

早晨，哥哥领我出去讨饭回来给妈妈吃，母亲说，她不想吃，这一天晚上，妈妈身上烧得滚烫！呻吟得很凄惨。黎明时分，妈妈稍微安静一些。哥哥端水来给她喝，妈妈说，她不想喝。天明了，哥哥又和我出去讨饭，中午回来，我们看到草棚外面站着很多人，他们都悲切地望着哥哥和我，走进草棚，我连叫了几声妈妈，都没有听见妈妈应声。哥哥惊慌地走到母亲身旁，看见妈妈静静地睡着。哥哥跪下去要扶妈妈坐起来，然而，这已经是不可能了，妈妈的身体冰冷僵直，屈不回来了。

啊！妈妈死了！哥哥伏倒在母亲身上大哭起来，我也跟着哭了。房主人可怜我母亲，给了一个旧席卷了母亲的遗体，掩埋了。

哥哥正在悲苦难言之际，房主人又叫给他请法师送鬼！我们哪有钱请法师？这时同乡中有人给哥哥出主意：偷跑！于是哥哥半夜里领我到母亲坟上哭了一场，就离开了。

哥哥领着我茫然走去。一路上不住地饮泣流泪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后来，哥哥定住神，一边讨饭，一边暗暗打听红军的消息。我兄妹俩白天讨饭，主要是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赶路，晚上，就在人家屋檐下或是堆放柴草的茅屋里睡一觉，天明了继续向前走。哥看见我身上的衣服实在烂得穿不成了，他把那些烂成絮絮串串的破布条儿仔细地打量，边往一块拼对边流泪思索：能不能把它们缀到一块儿？对了半天，因为没有针线和布，只好放下。

有一天上午，我们来到了一条大河边。哥哥领我到河边洗脸后回到岸上歇一歇，他呆望着滚滚激流，暗自伤心流泪，忽然，一条棍子打在

哥哥的肩膀上！回头一看，原来是灰棒佬儿^①！灰棒佬儿强迫哥哥给他们当挑夫，不由分说，就把一担乱七八糟的东西往哥哥肩上一搁，用棍子打着哥哥的光腿杆，强迫他挑起沉重的担子跟他们走，没办法，哥哥忍着愤怒，饿着肚子给这群灰棒佬儿挑行李。他肩上挑着沉重的担子，手里还要拖着。肩膀给担子压得肿起老高，腿杆被打得到处是伤。白军看守很严，哥哥无法逃脱。这一天晚上，哥哥听到同房被关的民夫们说，红军就在前头不远的山里跟白军打仗，半夜里，哥哥乘灰棒佬儿打盹儿的机会，背上我偷偷地跑了。

一口气跑了两天，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，哥哥领我到河边僻静处准备背我游过河去，正在张望之际，忽然看到斜对岸河湾里有一只小船，船上有位老人，哥哥背我飞跑到与那老人相对岸处，压低声音，隔河喊道：

“大爷！行行好，大爷！”老人早已看出我们的意思了。老人送我们过了河，哥哥把身上仅有的几个铜圆掏出来给他的时候，他却一个也没有要。并且，指给哥哥远处山坡上那个小庙说：

“到了那里躲避一时，等到天黑才能上山。到了那个山上就是……噢！”老人的话，我们听明白了。

按照老人的指点，我们果真找到了红军，见到了帽子上有红星的战士。

“同志哎！我可找到你们了。”两位红军战士已走到了哥哥面前，他们紧紧握住哥哥的手，当发现我正在哥哥的背上望着他们的时候，便惊奇地指着我说：“这个娃儿？”

“她是我的妹妹嘛！我一家五口人逃出来，死的死，散的散！现在就只剩下我兄妹两人了哇！”这时，泪水塞住了声音，哥哥泣不成声了。

红军战士们带我和哥哥去见了连长，连长让人给我们打来热水，哥

^① 灰棒佬儿：四川土话，“佬儿”指土匪，因国民党军军衣为灰色，故老乡称他们为“灰棒佬儿”。

哥和我洗完脸，一位背着挎包的红军战士来到棚子，他笑嘻嘻地从挎包里取出药瓶、药棉和镊子，细心而熟练地给哥哥和我的伤口擦了碘酒。

“哪个有多余的衣服，先拿出来给他们换一换。”连长一边说着一边在自己的小背包里搜寻着。立刻有许多人争相拿出自己的衣服并亲手给我和哥哥穿到身上，哥哥穿起军衣戴上军帽很匀称得体，显得很英武。可是没有我能穿的衣服，连长就亲自拿着针线把衣袖和裤腿长出的部分卷起来缝住，然后给我穿。

衣服刚收拾好，饭就端来了。连长接过饭，递给哥哥和我连声喊道：

“快吃饭！快吃饭！”

哥哥和我接住饭，坐在草铺上急忙吃起来。连长把同样两碗肉菜端来放到我们面前，看着我们吃饭。这雪白的大米干饭，肥美的肉菜，热腾腾，香喷喷！使我兄妹饥饿已久的肚肠顿时饱享洪福，使我兄妹如同回到了慈母的怀抱！

饭后，哥哥和我被招呼到另外一个小一点的棚子里休息。地上铺了厚厚的干草，干草上面已经铺好了毯子。一会儿又拿来了一条灰色军毯。这时棚子里挤满了人，哥哥让我先盖上毯子睡了，他和大家坐在草铺上说话。大家亲热地问哥哥一路上所受的艰难困苦，对我们一家人的悲惨遭遇，都深表同情，说了很多安慰的话，当知道哥哥曾在苏维埃担任过工作时，大家对他愈加敬重，热情地谈论着，久久不肯散去。

我们参加红军后不久部队就转移到另外一个山头。我们连队仍驻守在前沿阵地，同白军对峙。哥哥和连长把我送到后面山坡连队的炊事班。从此，我只有跟着年长的同志去前面送饭才能看到哥哥。分给我的工作是最熟悉的，如拾柴、捡菜、拾蘑菇。后来，快到送饭的时候，总要分配点儿工作要我做，不等我做完事情，他们就背起饭走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因为大人们担心我往前面送饭有危险。那几天，我非常想念哥哥。有一天，我看见饭菜都准备好了正要走，赶紧扛起饭铲前面先跑了。我走在两位炊事员中间，前面一位是背饭的，后面一位挑的是

菜和开水。走到离阵地不远处，前面传来了“注意隐蔽！”的警告声。话音未落，忽然响起一阵枪声，只听见走在我后面的那位同志“哎哟”了一声，我猛回头看见他身子向后一闪，扁担从肩上滑下来，盛开水的那只桶正往交通沟里滚。在这一瞬间，他猛推我一把，我也跌进了交通沟。他抱着一桶菜滑溜下来，右腿肚子被打穿，右脚上的那只鞋灌满了鲜血，穿不住，滑掉了。大家都跑过来看我们，帮助负伤的同志包扎伤口。哥哥急忙把我拉到他的身边埋怨道：

“哪个叫你跑到这里来的嘛！”

见到了哥哥，我什么也不怕了。高兴地又是跳又是蹦！可哥哥生气地批评了我一通，说我违反了红军的纪律，还给大人添了很多麻烦。连长也帮哥哥说：“红军是有铁的纪律的，每一个人都得遵守。”

从这天起，我安心我的工作，拾柴生火、捡菜、搬木耳，还有其他许多事情，渐渐地我习惯了这炮火连天的战斗生活。这以后，我很少见到哥哥，只听人说哥哥作战很勇敢，这期间负了两次伤，有一次还住了院。

过了不久，部队出发了。

由于年龄小的原因，当时对于时间、方向、人名、地名的记忆是很模糊的，只听见年长的同志说：今天是向东，向西或是向北；现在经过哪儿，今天宿营地是哪儿，要过什么节日了，我只是跟着部队行进在青山碧水之间。这期间和哥哥在行军途中偶尔相遇，只够说上几句话，又分别了！

有一天宿营早，哥哥来看我了，他笑着把我抱起来，我埋怨哥哥老是躲起来不见我，哥哥笑着对我解释说，他不是躲着我，也没有受伤，而是工作有变动，他被调到另外一个连队去工作了。我提出跟哥哥到新连队去。他劝我说，还是在原来连队好，人熟好招呼，比较方便，即使我俩在一起，因为工作忙，他也照管不了我。我想：哥哥说的话是很对的。他虽然没有明说，然而从他的谈话中我听出来他是调到新的连队担任领导工作了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我是红军战士，难道还要人专门来照管

吗？哥哥看出我听懂了他的话，非常高兴，很放心地走了。

春夏之间，部队打了一路恶仗，过了许多江河，来到了藏族地区。在这里，部队进行休整，准备过雪山。哥哥有时来看我，给我带来他亲手为我编的小草鞋，再三叮咛要我爱护身体，要经常洗脚，他保证经常来看我。

部队走过了天全、芦山，和二方面军胜利会师，这期间哥哥来看过我。有一次，哥哥又提到要改名字的事。这件事，母亲去世后，他曾经说过。他说，母亲一生很可怜，又死得那样凄惨，为了纪念母亲，我们就随母亲姓。母亲娘家是兴马坎胡家人，他改名叫胡少南，给我改叫胡秀英，后来我一直到延安都是叫这个名字。

会师的一天来到了！这一天，甘孜草原万里无云，红旗似火，人流如海，二、四方面军战友相逢，情绪热烈至极，大家互相热烈握手，拥抱，掷帽子！人们尽情地狂欢跳跃，开大会，领导讲话，表演文艺节目，杀牛宰羊大会餐。

会师后，部队进行了整编。有一天，哥哥来看我，他领我在草原里走了一会儿，然后，坐在草地上帮助我补衣服和修理草鞋。哥哥肤色黑里透红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显得更大更沉静了。他比原来消瘦多了，然而，越发显得干练和充满青春的活力。哥哥一边给我补衣服缀纽扣，一边问我的生活情况。他仔细地看着我笑一笑，好像要说什么，但是，又什么也没说。就这样，他给我穿好衣服，扣好纽扣，扎好皮带，端正了帽子，送我回到连队宿营地，他走了。紧接这次会面不久，哥哥又来看我，当时我想不到，这是兄妹最后的一次会面。同哥哥一起来的是一位政治委员。政委说话很和气，看上去很慈祥，他的年龄比哥哥大得多，因为作战负伤，门牙被子弹打掉了一颗，所以，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“豁牙政委”，我也这么称呼他，他一点都不见怪。

政委和哥哥领我在草原里走了很久。他们边走边说着话，我跟着他们跑前跑后采野花玩，有时也仰起头望一望高深莫测的天空，我们南